

非洲知识去殖民化：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胡朋志

内容提要 本文深入探讨非洲知识去殖民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旨在重建非洲知识的主体性与合法性，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框架，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包容的全球知识生态。非洲本土知识的认识论特征具有鲜明的具身性、社群性与实用性，知识的确证依赖于社群共识与实践效用，旨在维系生存与社群和谐。“认识论殖民”则通过语言霸权、教育体制以及构建“殖民图书馆”将非洲知识贬低为民俗与迷信，导致非洲思想史深层断裂。知识去殖民化是非洲重建主体性、实现真正解放的核心哲学命题，其核心诉求并不是用“非洲认识论”取代“西方认识论”，而是打破单一理性垄断，为人类认知提供另一种可能。非洲本土知识强调的社群关联、知行合一及“生命充盈”的价值追求，是对西方工具理性传统的必要补充与修正。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非洲知识去殖民化是推动全球知识体系走向多元化的关键一环，有助于将西方“绝对普遍性”拓展为“对话式普遍性”，未来需要以自信开放姿态切入全球对话，构建更丰富、公正且包容的人类知识图景。

关键词 非洲本土知识 认识论殖民 概念去殖民化
“殖民图书馆” 对话式普遍性

作者简介 胡朋志，绍兴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绍兴312000）。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非洲哲学的知识重构与全球对话”（25FZXB079）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下，非洲往往被描绘为理性的荒原与历史的虚无之地。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构建的知识体系不仅是其政治统治工具，更是一种认知暴力手段，它否定非洲本土知识的合法性，造成非洲现代思想史上的深层断裂。尽管 20 世纪中叶以来非洲国家逐步重获主权，但在认识论层面，西方范式依然占据着霸权地位。因此，非洲知识去殖民化不仅是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诉求，更是非洲重建主体性、实现真正解放的核心哲学命题，不但关乎非洲自身命运，还关乎人类如何超越狭隘的普遍主义，走向真正多元共生的未来。

非洲本土知识的认识论特征

非洲本土知识常通过非书写载体呈现，具体包括谚语、史诗、赞歌、鼓语、箴言、裁判辞、族谱、仪式剧、图案、工艺等。^① 这些载体并非知识的修辞外衣，而是知识的生成机制本身，例如谚语凝练社会规范，仪式调度“人—神—物”的关系秩序，工艺沉淀关于自然与人身的经验。这种多模态性挑战了以书写为唯一合法知识载体的现代知识偏见。非洲本土知识呈现出明显的具身性与实践性特征，比如对疾病的理解不仅是病原学意义上的知识，也包括与病人关系、家户伦理、社区应对等复杂配置；对土地的理解不仅是农学知识，也涉及祖灵、共享权利与代际义务。这种具身性要求知识的检验标准包含实践成功与关系修复双重维度，与将知识归结为命题真假的西方模式形成对照。^② 此外，非洲本土知识的运用旨在促成人格生成，人并非先天圆满的“道德—认识”主体，而是在社群礼制与公共实践中逐步“成长”（becoming）的存在。^③ 知识在此被理解为共

① Karin Barber *The Anthropology of Texts, Persons and Publics: Oral and Written Culture in Africa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Kwasi Wiredu *Cultural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 An African Perspectiv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0.

③ Ifeanyi A. Menkiti, “Person and Community in African Traditional Thought,” in Richard A. Wright (ed.) *African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79 p. 160.

同体中的德性实践，知者必须在社群关系中证明其判断力与可信度。因此，如同其他重要资产，知识的保存与传承往往通过“师徒—家族—行会—长老会”运行，而非靠去关系化的个人认证。为了更好地理解非洲本土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以下从知识主体、知识获取与确证、知识变迁和知识的社会功能四个方面讨论非洲认识论区别于西方认识论的主要特征。

（一）知识主体：社群性自我

知识主体关涉“谁在认识”“认识者具备何种特质”等根本性问题。自古希腊哲学发端，西方认识论对知识主体的探讨便呈现出向内聚焦的趋势。对个体化、理性化知识主体的系统阐述成形于近代哲学，尤其是笛卡尔以降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将知识的基础奠定在个体自我意识的确定性之上。这个“我”是一个纯粹的思维实体，独立于身体和外部世界，因此知识主体是个体化（individualized）、内在化（internalized）、理性化（rationalized）和自主的（autonomous）。后续无论是洛克、贝克莱、休谟的经验主义，还是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尽管在知识来源和范围上存在分歧，但其讨论的中心都是个体认知者的心灵结构、感知能力和理性范畴。

与西方强调个体性的知识主体不同，非洲认识论中的知识主体更突出其社群性、关系性和延展性。非洲认识论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知识的主体首先是社群（community）而非孤立的个体。荷兰哲学家哈明戈（Bert Hamminga）研究指出“在（古典）非洲的观点中，知识不是‘我’知道，而是‘我们’知道。知识是共通性的一种形式，而共通性是一切行动的最终标准，知识追求只是其中之一。”他进一步将社群比喻为一棵树：“这棵树知道，‘我们’知道。”树根是祖先，树干是成人，枝叶花朵是孩子。^①这意味着，个体的认识活动是在社群框架内进行的，知识的产生、

^① Bert Hamminga, “Epistemology from the African Point of View,” in Bert Hamminga (ed.), *Knowledge Cultures: Comparative Western and African Epistemology*, Rodopi 2005, pp. 57–58.

验证和传承都深深嵌入社群的集体实践和共享经验之中。因此，知识主体不是原子式的、与世隔绝的“我”，而是关系性的“我”，与家庭、氏族、部落以及整个社群紧密相连的“我”。这种关系性不仅包括与他人的横向联系，也包括与自然环境的深刻联结。在以社群为主体的认识论中，知识通常被视为社群共有的财富，而非个体私产，生成并获取知识的目的是促进整个社群生存、发展与和谐。知识的确证也更多地依赖社群的集体经验、历史传承和共识，而非仅仅是个体理性的推演。长者、智者等在知识确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的权威往往也来源于其对社群传统的深刻理解和在社群中受到广泛认可。

（二）知识获取与确证：多元路径与情境真理

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知识如何获得以及如何被确证为真，主要形成了两大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康德试图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认为知识是感性材料（来自经验）和知性先天范畴（来自理性）共同作用的产物。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方法成为西方认识论中知识获取与确证的主导模式，强调客观性、可重复性、可证伪性以及逻辑一致性。知识也被认为是可累积、可修正的，并趋向于对客观世界更精确的描述。20 世纪的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强调语言的清晰性和逻辑的严格性在知识确证中的作用。

非洲认识论的知识获取与确证路径更为多元，它不仅包含经验观察，更强调社群智慧、传统权威、实践效用以及与精神世界的联系。^① 非洲宇宙观主张精神与物质世界紧密联系，对万物有灵和生命力存在具有普遍信仰，强调身体、心智、灵魂与精神之间整体、有机及多维的相互联系，以

① Gloria Emeagwali, “Intersections between Africa’s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and History,” in Gloria Emeagwali and George J. Sefa Dei (eds.), *Afri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Disciplines* Sense Publishers 2014 pp. 1 – 18.

及社会、文化与自然的交汇。^① 这些都为直觉、灵感、梦境解析、预兆解读和占卜等非经验性的认知方式留有重要位置。在知识确证方面，非洲认识论是多元和多路径的。首先是以社群共识与权威见证作为确证方式。以南部非洲班图语族为代表，在众多非洲大陆文化传统中，一项知识主张是否真实可靠，往往与其是否获得社群认可，特别是来自长者、智者或具有特殊经验者的确认密切相关。其次是以实践效用与生命关联作为真理尺度。本土知识体系通常没有像西方知识那样被系统记录，“而是通过口头传述、实践代代相传，并逐渐完善。”^② 非洲认识论中的真理观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知识的价值和真实性常常通过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效果和对生命的积极影响度来衡量。最后是以人际和谐与伦理完整作为真理维度。非洲认识论在探讨真理时常常包含伦理考量，强调知识对促进人际和谐、社会公正和社群团结的积极作用。那些能够促进理解、信任与合作，并有助于修复社会裂痕、维护社群团结的言论或知识，更容易被认为是“真实”的。

相较于西方主流认识论对普遍客观真理的执着追求，非洲认识论更倾向于理解真理的情境和关系。由于知识的产生和确证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连，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就可以多元化，并且不同的理解在其各自的参照系内都可能是合理有效的。这并不必然导向虚无的相对主义，而是强调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寻求最有益于社群整体生存与发展的认知方案。

（三）知识变迁：适应性与开放性

西方认识论，特别是自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以来，内含一种强烈的

① Gloria Emeagwali and George J. Sefa Dei, "Introduction," in Gloria Emeagwali and George J. Sefa Dei (eds.) *Afri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Disciplines*, Sense Publishers 2014, p. xii.

② Stewart Lee Kugara et al., "Explor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Worldviews to Foster and Advance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Madimabe C. Mapaya (ed.) *African Epistem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Perspectives*, AOSIS 2022, p. 398.

“进步”观念，认为知识可以通过理性运用和经验积累而日益全面、精确和深刻。就具体的知识变迁机制而言，西方认识论研究中提出过以下主要观点：第一，累积性增长与不断“逼近真理”；第二，科学革命与范式转换；^① 第三，证伪主义与批判理性；^② 第四，内部修正与跨学科整合。

非洲知识变迁最主要的路径则是适应性调整与经验积累。非洲本土知识体系是在长期与特定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在传统生活方式中不断证实，其变迁往往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和满足社群的生存需求，其中包括借用、改造和整合外来思想的能力。^③ 这种变迁是主动的和经验驱动的，表明非洲传统知识体系具有一种内在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口述传统的动态传承也构成非洲知识自主变迁的一条主要路径。虽然口述传统强调对祖先智慧的忠实传承，但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微妙的调整和重新解释，以适应新的情境和听众。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后，包括维雷杜（Kwasi Wiredu）、穆迪姆贝（Valentin Y. Mudimbe）、奥鲁卡（Henry O. Orika）在内的非洲学者和思想家开始致力于去殖民化，重新发掘、评估和振兴本土知识体系，并探索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结合点，这其中包括“要求纠正欧洲中心主义学者对非洲的错误观念与歪曲描述”^④，“对旧有认识论进行复兴、评估和改造，以适应新的后殖民现实”^⑤。

综合来看，西方认识论通过其内在批判机制、理论竞争和对经验证据的重视，形成了一套强大的知识更新系统，驱动持续的科技和社会变革。非洲认识论在传统上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和整合能力，使其知识体系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持韧性。当前，非洲知识体系的变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

①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②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Hutchinson, 1959.

③ Kwame Anthony Appiah, “African Studies and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in Bert Hamminga (ed.), *Knowledge Cultures: Comparative Western and African Epistemology*, p. 48.

④ Munyaradzi Mawere and Tapuwa R. Mubaya, *African Philosophy and Thought Systems: A Search for a Culture and Philosophy of Belonging*, Langaa RPCIG, 2016, p. 50.

⑤ Gloria Emeagwali, “Intersections Between Africa’s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History,” in Gloria Emeagwali and George J. Sefa Dei (eds.), *Afri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Disciplines*, p. 2.

图景，既有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有对西方知识的选择性吸收，更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本土知识与现代挑战相结合的努力。

（四）知识的社会功能：维系生存与社群和谐

知识不仅是关于“真”与“假”的判断框架，更是一种被嵌入制度、经济、伦理与身份建构的社会资源。在西方认识论发展历程中，知识的社会功能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演变。古希腊时期，知识对城邦治理与灵魂陶冶都具有重要作用。近代启蒙时期，知识被赋予帮助人类脱离蒙昧、推动历史前进的使命。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知识是驱动生产和创新的主要依据，尤其是二战后，在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概念中，知识被视为经济增长新引擎。^①在当代西方社会，知识的社会功能更趋复杂，如福柯所说“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及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②

非洲认识论中的知识，其社会功能更侧重于维护社群的整体福祉，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以及确保文化价值和生存智慧的代际传承。非洲认识论首先确保非洲人民可以适应环境并维系生存，因此非洲本土知识体系包含了大量关于自然环境、农耕、狩猎、医药等方面的实用知识。加纳哲学家阿皮亚（Kwame A. Appiah）引用本土谚语“我们吃的东西是我们的祖先昭示给我们的”^③，形象地展现了知识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方面的核心作用。然而当生存不受严重威胁时，维护社群和谐与促进共同福祉就成为非洲认识论需承担的社会功能。乌班图精神是非洲许多文化中知识社会功能的核心体现，被称为“南部非洲世界的主要道德罗盘”和“非洲

①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Basic Books, 1999.

② [法] 福柯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0页。

③ Kwame Anthony Appiah, “African Studies and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p. 23.

对世界的最大贡献”。^① 以其为代表，本土知识体系“帮助维护了自然环境、和平、秩序以及非洲社会结构的完整性”^②。推动文化遗产与身份认同是非洲认识论的另一项主要功能，口述传统是非洲知识传承的主要方式，神话、史诗、谚语、故事、仪式等承载着社群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宇宙观和行为规范，塑造社群成员的文化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对非洲认识论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打破西方认识论的霸权，推动对知识多样性的承认与尊重。承认本土知识是挑战西方知识霸权，并在社会发展中创造更具包容性知识生产方法的关键一步。当知识的存在形态从书写独尊转向多模态并举，当确证的方式从单一实验主义转向情境化的组合验证，非洲本土知识便能从“被观看”恢复到“会生产”，去殖民化知识生产便会成为一套可持续的知识生态工程。

认识论殖民：暴力与断裂

殖民主义绝非纯粹的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其更为持久和隐蔽的维度在于一场深刻的认识论征服。这种征服通过系统性边缘化、瓦解乃至清除被殖民地区的本土知识体系，并代之以宗主国的知识框架、价值标准和认知模式，从而实现对被殖民者心智的“内在殖民”，即“认识论殖民”（epistemic colonization）。认识论殖民与殖民扩张形成紧密的共谋关系，它不仅为后者提供合法性辩护，更构建了一套权力等级森严的全球知识秩序，其影响至今仍在全球南方尤其是在非洲大陆广泛存在。

认识论殖民的核心是殖民者自我标榜的“文明使命”。这一话语巧妙地将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包装成一种对“野蛮”“落后”民族的

① Munyaradzi Mawere and Tapuwa R. Mubaya *African Philosophy and Thought Systems: A Search for a Culture and Philosophy of Belonging* p. 91.

② Stewart Lee Kugara et al., “Explor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Worldviews to Foster and Advance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Madimabe C. Mapaya (ed.) *African Epistem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Perspectives*, p. 392.

道德拯救和文化启蒙。然而，法属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思想家赛萨尔（Aimé Césaire）在其檄文《论殖民主义》中提出一个公式：殖民 = 物化。^①这揭示了殖民主义最黑暗的内核：它不是文明的传播，而是人性的毁灭。“文明使命”的实质，是一个以西方文明为唯一标尺，对其他文明进行等级划分并予以改造的认识论工程。

在这一工程中，教育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殖民地教育体系的设计，首要目标并非开启民智或培养独立的个体，而是造成一种文化征服上的既成事实。肯尼亚作家、政论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将殖民教育形容为一颗“文化炸弹”，其作用是“毁灭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名称、语言、环境、斗争传统、统一体、能力以及最终对他们自身信仰的认同”，并让他们视自己的过去为“一片需要远离的荒原”。^②殖民地学校通过课程设置、教学语言、考试认证与职业路径规划等逐步把非洲青年纳入“帝国—资本主义”的知识与劳动力分工体系。以课程设计为例，在历史教学中，殖民者将欧洲历史置于世界史的中心，将非洲书写为“无历史”和“欧洲走向现代”的附录；在文学教学中，学生们被要求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却对本民族丰富的口述史诗和谚语一无所知；在地理课上，世界的中心是伦敦或巴黎，非洲仅仅是地图上被分割并等待开发的边缘地带；科学课程以方法论“中立”为名，抹除知识生产的历史政治性，忽视本地技术与环境知识。^③学生们在此叙事中学的是一套“世界地理”与“人类文明史”的地图，其中非洲的主体性被淡化为“资源地—劳力库—实验场—传教区”。

语言是认识论战争的核心战场之一。殖民者强制推行宗主国语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为唯一的官方和教学语言，而将本土语言贬为

① Aimé Césaire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Translated by Joan Pinkha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 p. 42.

② Ngugi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James Currey & Heinemann ,1986 p. 3.

③ Ibid. pp. 90 - 94.

“方言”，禁止在正式场合使用。当一个非洲孩子因为在校内讲母语而受到体罚或羞辱时，他所受到的创伤远不止于身体。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暗示：他从家庭和社群继承的语言是低等的，与这种语言相关联的文化、智慧和情感也是低等的。这种语言异化直接导致思想异化，接受殖民教育的精英被迫用殖民者的语言来思考和表达，他们的思维框架、概念工具乃至审美情趣都逐渐与本土文化割裂。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的著名思想家、革命家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对此有深入的分析：被殖民者通过掌握殖民者的语言，试图获得其文化世界的入场券，从而摆脱自身的“黑人性”（blackness），但结果却是陷入更深层次自我否定和身份焦虑中。“我的‘黑人性’就在这里，浓厚且不容否认。它折磨着我，追逐着我，使我不安，让我恼怒。”^①

一些著名哲学家，如休谟、康德、黑格尔等，对西方的认识论殖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休谟说“我倾向于认为黑人，以及其他各类人种，在本质上就劣于白人，它们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文明的复杂程度上比得过白人国家，也从来没有一个杰出的个体可以在行动或者思辨上超过白人。”^② 康德认为“非洲黑人天生所思所感就微不足道。……在白人和黑人两个人种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在心智能力上的表现就如同在肤色上的表现一样明显。”^③ 黑格尔直接否认非洲具有理性和道德，他称非洲人是生活在“黑暗大陆”的落后人种，“黑人的具体特征很难理解，当说到黑人时，我们必须放弃我们思想中常用的原则——各种普遍性对他们完全不适用。”^④ 在黑格尔看来，非洲没有自己的知识积累，也就没有社会进步，没有自己的历史。

殖民主义之下，非洲大陆知识传播的本质是一种“认知暴力”。它否

①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lated by Richard Philcox, Grove Press, 2008, p. 96.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Clarendon, 1978, pp. 146 – 147.

③ Munyaradzi Mawere and Tapuwa R. Mubaya *African Philosophy and Thought Systems: A Search for a Culture and Philosophy of Belonging*, p. 37.

④ Ibid. p. 38.

定本土知识的合法性，强制灌输一套外来的知识体系，造成非洲知识生产和传承的严重断裂。祖辈流传下来的农耕智慧、医疗知识、治理模式、宇宙观念和伦理规范，在“科学”“现代”和“文明”的话语冲击下被系统性地标签化为“迷信”“巫术”和“陋习”。这种断裂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仅剥夺了非洲人民对其知识体系的自主权，更使其对自身文化产生深刻的疏离感、困惑乃至自卑，从而为稳定和延续殖民统治提供最坚实的心理基础。

认知论殖民带来两个严重后果：对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性瓦解和时代性剥夺。一方面，殖民知识体制的最终效应是知识主体性重构。被殖民者在语言、皮肤与文化符号的凝视中被迫以殖民者为镜，从而在心理上形成“黑皮肤—白面具”的撕裂状态。^① 于非洲青年而言，体制的竞赛逻辑进一步将成功定义为“越是远离本土语言与传统，越能攀升社会阶层”，由此形成内在的鄙视链。另一方面，经典民族志话语通过将非洲文化放置于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实现了一种时代性的剥夺：被研究者被叙事性地安置在“过去”，而研究者占据“现在”，以此巩固知识主体/客体的时间距离。这种时间政治与殖民空间政治配合运行，使非洲知识被固定为“传统”之物，等待被现代知识拯救、解释和改造。在经验层面，这类叙事配合博物馆展示、民俗展演与民族志影像等共同生成可消费的他者性，同时为行政分类、法律差别对待提供认识论上的根据。

最终认识论殖民为非洲铸造了一个“殖民图书馆”，^② 这是一套互为支撑的“概念—文献—制度”网络：旅行记、传教士报告、殖民地行政档案、博物馆收藏、人类学民族志、语言分类、地图与地名、进化论与种族学的知识谱系等。这一图书馆通过“命名—归档—比较—诠释”的方法，先行设定“非洲是什么”“非洲人是谁”，从而将非洲多样的知识传统纳入既定坐标中。被纳入者往往被定位为“口传—感性—前逻辑—传统—

①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Grove Press 2008.

②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5.

集体”的他者，服膺于“书写—理性—科学—现代—一个人”的中心。这种中心/边缘的分布不只是描述性的，它还决定了证词的证明力与可见性：口述史被视为“传说”，谚语被视为“民俗”，仪式被视为“迷信”，草药被视为“巫术”，而殖民学术文献则被视为“知识”。这一结构导致非洲知识的“降级再编码”，本土知识被“博物馆化”与“民俗化”，呈现为与科学分立、与现代性对立、与普遍性无涉的传统碎片。

应对与行动：知识去殖民化的主要路径

“认识论殖民”是一场通过知识进行的征服与剥夺，因此非洲的知识去殖民化就是一场旨在收复失地、重建家园的认识论解放运动。这场运动远非简单的“回到过去”或对西方知识的全然拒斥，而是一个复杂却又富有创造性的动态过程，它既要破除殖民主义遗留的知识枷锁，也要审视本土传统自身的历史局限。这一过程涉及对本土传统的再认识、再评估和再创造，最终恢复本土知识的合法性与活力，使其成为非洲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并最终帮助推动一种更加包容、平衡的全球知识生态的形成。

面对殖民主义留下的思想废墟和文化断层，非洲思想家发展出一系列细致且实用的研究路径，从而能够系统性地开展知识去殖民化工作。这些路径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非洲知识自主性的重建。限于篇幅，以下简述维雷杜的概念去殖民化、穆迪姆贝的知识考古和以奥鲁卡为代表的口述史哲学阐释。

（一）概念去殖民化

加纳哲学家维雷杜是非洲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当代非洲哲学研究主要面临两种不当倾向——“殖民化”（colonization）和“愚昧化”（stultification）。“殖民化”是指在非洲哲学研究中不加批判地、不适当地使用源自西方的知识模式、概念框架和价值预设。这种殖民化既

可能表现为西方学术范式对非洲思想的强行规训，也可能体现为非洲学者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无意识、盲目地借用和套用西方概念，从而遮蔽或扭曲非洲本土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其结果是，非洲哲学可能会沦为西方哲学的拙劣模仿或注脚，失去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力。“愚昧化”是指在强调回归本土传统时，不加甄别地固守或浪漫化非洲传统文化中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甚至阻碍社会进步的观念和习俗。维雷杜强调必须对传统进行批判性审视和反思，他指出“同样需要迫切实现的就是对我们自己传统哲学的细致审查，并以此为基础将我们审查自己传统所得与其他任何现代世界的智力成果融会贯通。”^①

面对上述双重挑战，维雷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自己的哲学研究纲领——“概念去殖民化”。^② 这一纲领旨在通过批判性的哲学分析，清除非洲哲学研究中源于西方的未经审视的同化现象，以及非洲本土传统中那些“令人厌恶的”阻碍进步的因素。其核心目标有二：第一，通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甄别出那些真正适用于非洲哲学研究的概念工具，无论其来源是西方还是非洲本土，最终建立起植根于非洲经验、具有非洲特色且能够有效回应非洲现实的真正的非洲哲学；第二，通过对非洲本土哲学资源的深入挖掘和现代表述，提炼出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概念和洞见，从而使非洲哲学能够为世界哲学发展作出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贡献。^③

概念去殖民化不仅是一个理论框架，更是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哲学实践方法，它要求哲学家运用批判性思维和分析工具，对哲学研究中使用的核心概念进行系统性审查、甄别与重构。虽然维雷杜并未给出一个操作流程，但在其哲学实践中概念去殖民化大致包含 5 个相互关联的步骤：一是识别问题概念，二是深入语境分析，三是跨文化比较与对质，四是批判

① Oladipo Olusegun (ed.) *The Third Way in African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ur of Kwasi Wiredu*, Hope Publications 2002 p. 328.

② Kwasi Wiredu *Philosophy and an African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③ Oladipo Olusegun (ed.) *The Third Way in African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ur of Kwasi Wiredu*, 2002 p. 328.

性评估与甄别，五是概念重构或再阐释。维雷杜的哲学著作中不乏运用上述方法进行概念去殖民化的案例，以下仅以“真理”（nokware/truth）概念去殖民化为例简要说明。^① 维雷杜发现，西方哲学中的真理观并不能完全捕捉阿坎语中“nokware”的内涵。在阿坎语境中，“nokware”固然有指称事实的一面，但更强调事实要与意见的公正性以及促进社群和谐的目标一致。一个陈述是否为“nokware”，不仅看它是否符合事实，还要看它是否出自一个可信赖的、公正的人，以及它是否对社群有益。通过细致的语言分析，一方面维雷杜批判了西方关于真理的各种理论（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指出它们各自的洞见与局限，推动了对非洲“真理观”的去殖民化处理；另一方面他揭示了“nokware”的丰富内涵，并试图在阿坎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兼顾认知与价值维度的真理观。他认为，这种真理观可能比纯粹认知主义的真理观更符合人类生活的整体需求。

马索洛认为，维雷杜通过这种方式，“既揭示了源自不同文化的思想传统之间的概念差异，又提出新颖的跨文化方法，以重新思考那些在有限的（西方）传统语言框架内始终悬而未决的新旧哲学问题。”^② 概念去殖民化的要求还不止于此，如洪通吉所说，维雷杜认识到语言的相对性，他号召回到非洲语言并不是要自我设限，而是如他自己所说“各位非洲哲学家们，让我们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思考吧！”^③ 通过概念去殖民化，维雷杜希望在推动非洲哲学独立与繁荣的同时，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普遍性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哲学”。

① Kwasi Wiredu,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the Akan Language,” in P. H. Coetzee and A. P. J. Roux (eds.), *The African Philosophy Reader*, Routledge 2003, pp. 280–282.

② D. A. Masolo, *Self and Community in a Changing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40.

③ Paulin J. Hountondji, *The Struggle for Meaning: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01.

（二）知识考古

如果说维雷杜的路径是一种“向内看”的语言分析和概念重构，那么刚果（金）思想家穆迪姆贝则提供了一种“向外看”、旨在解构西方关于非洲知识体系的宏大方案。他借鉴并发展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将其运用于非洲语境，深刻剖析了西方知识体系如何“发明”非洲，并试图为非洲知识的“自我书写”开辟道路。^①穆迪姆贝的核心关切在于知识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殖民”与“后殖民”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这种关系如何塑造关于非洲的认知、表述和实践。他认为，西方世界通过一套复杂的话语实践、学术建制和文本生产，系统性地将非洲客体化和他者化，使其成为一个被动的、缺乏自主历史叙事能力的存在。因此，非洲知识的解放与重建首先需要对这一“殖民图书馆”进行彻底的知识考古学考察，揭示其深层的权力运作机制和认识论预设。然而，穆迪姆贝并非简单照搬福柯的方法，他强调非洲语境的特殊性，特别是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断裂与创伤。他指出，福柯所描述的欧洲知识型演变，在非洲则表现为一种外来的、强加的知识型对本土知识体系的覆盖与边缘化。因此，穆迪姆贝的知识考古学更侧重于揭示这种知识的“暴力”和“他者化”过程。

穆迪姆贝的知识考古是一种批判性的探究姿态和系统性的分析路径，其方法流程受福柯思想的启发，同时结合非洲“殖民”与“后殖民”的特殊语境，可以被概括为6个相互关联的步骤：一是界定分析对象与“考古区域”，二是识别、梳理“陈述”及其模式，三是探寻话语构成规则，四是揭示“权力—知识”的共生关系，五是描述知识型及其可能的断裂，六是走向“知识的重整”与非洲自主话语建构。穆迪姆贝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流程，是一个从具体文本出发层层深入，揭示话语构成、权力运作和

^①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穆迪姆贝对“知识考古学方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本书中，下文的讨论也主要源自此书。

认识型框架的分析过程。通过以上步骤的有机结合，穆迪姆贝试图深入“殖民图书馆”的底层，揭示其构造逻辑和权力效应，从而为“解放”非洲知识、重塑非洲主体性开辟道路。知识考古学方法可以被应用于非洲哲学、非洲历史、后殖民文学批评、人类学反思以及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以下仅举一例简要解释其具体应用。

案例：解构“非洲哲学”的早期建构——以《班图哲学》为例^①

分析对象与考古区域：唐普尔的《班图哲学》本身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构成关于“非洲是否存在哲学”以及“什么是班图人思想体系的核心”的话语场域。

核心陈述与概念：唐普尔的核心陈述是“班图人的行为受到一套内在一致的本体论的指导”，其核心概念是“生命力”。他认为，对于班图人而言，存在的等级、万物的互动、伦理规范乃至宗教信仰都围绕着“生命力的增强与减弱”这一中心原则展开。^②

话语构成规则与陈述模式：唐普尔将原本弥散在班图人生活实践、口述传统、仪式行为中的思想元素，整合并命名为一种可以与西方哲学体系相提并论的“哲学”。随后唐普尔以比利时方济各会传教士的身份发言，声称其研究基于“与土著人的长期接触”，目的之一是让殖民者和传教士更好地理解非洲人，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文明化”和“福音化”工作，由此构建陈述模式。

“权力—知识”的共生：穆迪姆贝指出，唐普尔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当时认为非洲人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偏见，似乎赋予班图思想一定的尊严。然而，这种“发现”仍然是在殖民权力结构下进行的。更深层次地看，唐普尔对班图哲学的描述，实际上是将班图思想纳入一个西方可理解、可控制的知识框架，定义什么是“真实的”班图思想，从而可能

① 本案例来自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第三章“The Power of Speech”第一小节“The Missionary’s Discourse and Africa’s Conversion”。

② R. P. Placide Tempels *Bantu Philosophy*, Présence Africaine, 1959 pp. 50 – 51.

排斥其他不符合此框架的表达。

认识型及其影响：唐普尔的工作尽管具有开创性，但仍未完全摆脱殖民认识型的窠臼。它试图用西方的概念工具去“拯救”和“阐释”非洲思想，这本身就隐含了一种知识上的不平等。穆迪姆贝认为，这类研究往往将非洲思想“对象化”，使其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的“他者镜像”。

（三）贤人哲学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等级中，书写文本长期以来被置于首要地位，口述传统则被贬为不可靠的、非理性的“神话”或“民间传说”。这种偏见直接导致非洲丰富的思想资源被忽视，因为在非洲许多地区，历史上知识承载与传递主要依靠口述形式进行。所以，将口述史提升到认识成果的高度，是知识去殖民化的一项核心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起，肯尼亚哲学家奥鲁卡便启动一项旨在发掘、记录和分析非洲社会中具有哲学思辨能力的“贤人”及其思想的研究计划。他坚信，“贤人哲学”（Sage Philosophy）是非洲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将其视为非洲哲学研究领域最有前景的趋势之一。^① 奥鲁卡及其团队随后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系统地记录和整理多位肯尼亚本土贤人的思想。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汇集于1990年出版的著作《贤人哲学：非洲哲学中的本土思想家和现代争论》（简称《贤人哲学》）。^② 贤人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含5个关键环节：一是贤人的界定与选择，二是田野调查，三是对话式访谈，四是录音与转录，五是翻译和分析。基于这一方法，奥鲁卡及其团队通过实地访谈，整理了数十位具备哲学反思特征的非洲本土贤人。《贤人哲学》第二部分系统记录了13位代表性贤人的思

① Henry Odera Oruka (ed.) *Sage Philosophy: Indigenous Thinkers and Modern Debate on African Philosophy*, Brill, 1990, pp. 27–28. 奥鲁卡列出非洲哲学发展的四个趋势包括：人种哲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哲学、专业哲学和贤人哲学。

② Henry Odera Oruka (ed.) *Sage Philosophy: Indigenous Thinkers and Modern Debate on African Philosophy*.

想，以下仅以一位为例，展现其思辨方向和理论特征。

保罗·姆布亚·阿科科 (Paul Mbuya Akoko) 被奥鲁卡视为哲学贤人的典范，因为他超越了社群传统中未加反思的信仰，通过独立的理性反思来批判性地对其加以改进。“这位哲学贤人推理说，如果有多位彼此对立的神统治宇宙，那么必然会产生诸神之间的竞争与嫉妒，随之而来的便是混乱与毁灭。这些论证是否无懈可击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在此看到了一位哲人正在进行审慎的思考。”^①

贤人哲学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其口述传统。奥鲁卡指出，哲学的根基不是文字，而是理性反思，口述与文字只是载体，而不是哲学本身的限度。^② 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实践，贤人哲学中的现场对话和纠错机制反而有助于保留言论的开放性和思想的动态性。奥鲁卡及其同仁在贤人哲学文本整理中常常对不同贤人的看法予以归纳比较，推动其超越个体口述，走向理论升华，而理论分析的严谨性反过来又丰富了口述内容，使其成为非洲哲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桥梁，推动口述传统中的思想内容走向深入和系统化。

就其建构作用而言，奥鲁卡及后续研究者通过贤人哲学计划，发掘、记录并呈现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非洲本土哲学思想，这些思想涵盖形而上学、伦理学、认识论、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展现了非洲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这些来自贤人的原始声音和独特见解为非洲哲学学科提供了宝贵的本土思想素材，使其不再仅仅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或回应，而是拥有自身独特的视角和议题。贤人哲学坚持在非洲口述传统中寻找并发现个体理性反思，从而帮助确立非洲哲学的主体性身份，证明非洲哲学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不可否认的是，以上三条路径都明显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维雷杜深受西方分析哲学，尤其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影响；穆迪姆贝全

① Henry Odera Oruka (ed.) *Sage Philosophy: Indigenous Thinkers and Modern Debate on African Philosophy* p. 159.

② Ibid. p. 16.

面借鉴并发展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奥鲁卡在整理贤人哲学思想时也是以西方哲学现有的知识体系为分析框架。但这些借鉴都是以发掘和保留非洲本土哲学思想为目标，在现代非洲哲学知识体系构建初期，这样的借鉴不仅合理而且必要。这三条路径虽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致力于重建非洲知识的合法性。那么，通过这些路径，最终希望构建一种怎样的知识体系？

知识图景重构：目标、特征与意义

非洲知识去殖民化的根本宗旨在于完成一场“知识图景重构”。这一重构不仅是非洲重塑思想主体性的必由之路，更是对人类整体认知框架的有效拓展。具体而言，这幅知识图景需至少沿着三个维度展开：在认识论上，确立包容多元理性与现实关怀的新型知识观；在价值论上，将知识生产锚定于实现社群繁荣与“充盈生命”的伦理归宿；在全球视野上，推动非洲从理论的被动消费者转变为全球知识的积极共建者。

（一）认识论重塑：迈向多元理性的知识观

非洲知识去殖民化的深层逻辑在于突破西方主流认识论对“知识”与“理性”的狭隘定义，确立一种基于多元理性的新型知识观。这不仅是恢复非洲知识主体性的必经之路，更是对全球知识格局的一种建设性重塑——它旨在走出西方将知识等同于以命题形式表达、可验证的“科学知识”的单一范式，不再将其他认知方式贬低为“传说”或“迷信”，从而为人类认知世界贡献一种更包容、更具生命力的理解框架。

要实现这一宏大的图景，首要任务是认可理性的多元化形式。非洲认识论并不否认逻辑理性的重要性，但坚决主张存在其他同样合法且至关重要的理性形式。相对于西方的理性观念，非洲传统思想中包含一种“关系理性”，其首要功能并非对客观事实进行冷峻分析，而是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维系和修复社群关系，寻求和谐与共识。与此同时，承认理性的多元

化也意味着承认通往智慧的道路不止一条，这其中包括在特定技艺和劳动中体现出来的实践理性，例如一个熟练的织工或铁匠在操作中所展现出的那种精准有效的实践智慧。

理性的多元化必然带来知识形态的极大拓展，使得知识范畴不再局限于书面理论。在新的认识论视野中，知识应当涵盖更广阔的谱系：既包括通过观察和实践获得的关于自然事实的“经验知识”，也包括那些储存在身体记忆和肌肉感觉中的“具身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知识观为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智慧形式恢复合法性，这就包括关乎社群历史与价值观的“社群知识”，以及关于生命意义与精神世界洞见的“灵性知识”。这种分类将会消解科学与非科学的僵化对立，为一场更全面的知识生产奠定哲学基础。

随着知识形态的丰富，衡量知识“真伪”或“好坏”的标准也发生根本性革新。非洲认识论并不执着于单一的“真理符合论”，相反它采纳一种更具实用主义和融贯论色彩的真理观。在这一框架下，一个知识主张的真理性或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它是否与外部实在相符，更取决于其实用性与和谐性——即看它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以及是否与社群的核心价值观融洽，其最高的评价标准在于考察该知识是否能够促进个体和社群的“充盈生命”。这就要求将哲学研究从云端拉回坚实的大地，使其回应非洲人民最迫切的生存挑战。尼日利亚哲学家莫莫（Campbell S. Momoh）曾呼吁非洲建立一种“饥饿哲学”，即一种能直接处理饥饿、贫困、疾病和政治压迫等现实问题的哲学。^①这一呼吁深刻触及非洲哲学的核心关切，正如加纳哲学家哥耶克耶（Kwame Gyekye）所强调的，“非洲哲学必须和人民生活直接相关，以便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具体问题。”^②这意味着，理论价值不在于其逻辑结构的精巧，而在于其行动的效能。例如，对乌班图哲学的研究不应

① Campbell Shittu Momoh (ed.) ,*The Substance of African Philosophy* ,African Philosophy Projects Publications ,1989 p. vi.

② Kwame Gyeky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frican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5.

止步于概念史的学术梳理，而应探索其在修复性司法或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中的具体应用。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迫切要求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

（二）价值论回归：知行合一与充盈生命

非洲去殖民化的知识生产在逻辑上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价值论回归，它不再纠缠于西方认识论中主客体、理智与情感、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将认知、伦理与行动融为一体的整体性世界观。在这种视野下，知识不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镜像，而是内在于生命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回归具体表现为以知行合一作为知识生产的实践品格，并以“充盈生命”作为其终极的价值归宿。

价值论的回归首先体现为对知行合一的坚持。在西方学院派传统将理论思辨置于实践活动之上的背景下，非洲思想视这种割裂为认识上的“残缺”，因为知识的最终价值在于其实用性，即它能否导向智慧的行动和完整的生活。这种观念使得非洲知识生产天然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它并非始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第一原理，而是始于贫困、疾病、冲突等具体的生存挑战。因此，知识的合法性必须由其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实际效能来检验，这决定了非洲认识论必然是一种入世的、关怀的、致力于行动的认识论。

作为连接“知”与“行”的桥梁，非洲知识生产积极拥抱知识的“价值负载”，强调知识必须服务于特定的伦理目标，其中社群和谐与繁荣占据核心地位。非洲乌班图思想中“他人在故我在”（umuntu ngumuntu nga bantu，祖鲁语）^①为知识生产设定了明确的伦理边界：知识的获取和使用必须以增进社群福祉为首要考量。在这一框架下，任何即便带来经济利益但破坏社群团结或生态环境的技术，都会被视为“坏知识”。这种将知识与伦理紧密捆绑的倾向，赋予非洲认识论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色彩，即知识是社群共

^① Mogobe B. Ramose *African Philosophy Through Ubuntu*, Mond Books Publishers, 1999, p. 88.

享的公共产品，而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是服务人民，这是对工具理性与极端个人主义的有力矫正。

无论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路径，还是价值负载的伦理导向，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本体论目标——“充盈生命”。这一概念超越了单纯的生物学生存，指向一种整全性的繁荣：它既包含个体身心健全与德性完善，也涵盖社群和谐共生与社会公正，更延伸至人与自然平衡以及对精神维度的尊重与文化遗产。可以说，“充盈生命”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性的理想状态，非洲知识生产的全部努力——无论是对传统的发掘还是对现实的批判——都是围绕如何通达这一状态而展开。它将哲学思考从对抽象“真理”的探究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具体营造，将哲学家的角色从单纯的“爱智慧者”拓展为“促进生命充盈的行动者”，从而真正实现价值论在知识生产中的核心回归。

（三）全球视野：从“绝对普遍性”到“对话式普遍性”

非洲知识去殖民化的全球意义，首先在于它对长期支配全球知识秩序的核心预设——西方知识所宣称的“绝对普遍性”——发起了认识论挑战。殖民主义知识霸权的关键策略在于将源于欧洲特定历史与权力经验的“地方性知识”，装扮成一种超越时空、客观中立的普遍真理，一种全能的“无视角之视角”。维雷杜的概念去殖民化和穆迪姆贝的知识考古学揭穿了这一神话，他们证明了这种所谓的“普遍知识”实际上是被权力强行全球化的欧洲特殊经验。因此，去殖民化必须要对这种虚假的“绝对普遍性”祛魅，将康德的“绝对命令”或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等理论放回其产生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西方知识洞见，而是要求承认其局限性，并坚持当这些理论被应用于非西方社会时，必须经过审慎的批判、改造和“再语境化”，从而为真正的跨文化对话清理出平等的空间。

在解构旧神话的同时，非洲思想家们并未滑向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基于“对话式普遍性”的新范式。维雷杜对“认识普

遍性”（epistemic universals，如基础逻辑规则）和“文化普遍性”（cultural universals，如具体的道德规范或艺术形式）做出区分。他认为，虽然前者可能是全人类共享的底色，但后者往往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质。^① 基于此，非洲知识生产所追求的不再是一种预先设定、由单一中心向外强行辐射的“绝对普遍性”，而是一种在不同文化主体的交流与碰撞中生成的“对话式普遍性”（dialogical universality）。在这种视野下，真正的普遍性并非现成的教条，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诞生于不同知识体系的平等对话、相互质询与批判性学习之中。这意味着，人类经验虽有共通基础，但面对共同挑战时所发展出的多样化智慧形式才是人类普遍精神财富的真实内容。

最终，从“绝对普遍性”到“对话式普遍性”转向，要求非洲知识生产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这不仅是一场对内的“自我回归”，即非洲人民需要重新珍视自己的语言、历史与世界观，建立坚实的主体性，更是一场对外的主动“贡献与分享”。非洲强调自身特殊性——如其独特的生态智慧、社群伦理或修复性司法观念——并非走向封闭的孤立主义，而是为了以一个拥有独立声音的对话者身份参与全球知识构建。在这个过程中，非洲不再是西方理论的被动消费者，而是多元世界的积极创造者。这种通过展示自身独特性来丰富人类整体认知的过程正是“对话式普遍性”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

挑战与反思

当非洲知识去殖民化行动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日益广泛的关注与共鸣时，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显得尤为关键。诚如穆迪姆贝所警示的，如果我们未能审慎地检视去殖民化的路径，即使在最明确的“非洲中心主义”描述中，分析模型也显性或隐性地依赖于西方的认识论秩序，从而在反抗旧

^① Kwasi Wiredu *Cultural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 An African Perspective* pp. 27 – 28.

霸权的过程中制造出新的认知牢笼。^①就当前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而言，必须警惕并超越三种主要倾向：盲目的排外主义、逆向的种族中心主义以及取消主义的理论消解。这三种倾向看似带有鲜明的反殖民色彩，实则可能以隐蔽的方式阻碍非洲知识主体性的真正重建。

第一种需要警惕的倾向是陷入盲目的、反应式的排外主义陷阱。其核心逻辑在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将一切源于西方或与殖民历史相关的事物——无论是科学方法、民主制度还是现代技术——不加分辨地贴上“殖民工具”的标签予以全盘否定。这种立场虽然在情感上根源于对殖民创伤的合理反弹，但在认识论层面却违背了维雷杜关于“概念去殖民化”的要求。盲目排外主义的危险在于“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它在拒绝殖民霸权的同时，也拒绝了现代性中具有普遍价值的知识成果，从而导致自我隔离。更深层的悖论在于，这种做法往往深陷于殖民逻辑的镜像之中——它的全部能量来自“反抗”，其身份认同建立在对“西方”这一他者的否定之上，而非建立在对自身内在价值独立的肯定之上。如法农所言，“任何自我定位或自我固着，都维持着对‘他者崩塌’的依赖关系。”^②如果被殖民者的主体性仅仅是殖民者的反面，那么这种主体性依然是被殖民的。因此，去殖民化不应是简单的反西方，而应是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在开放中寻求自主性。

第二种倾向则更为隐蔽，它表现为将殖民者“他者化”之后，试图建立一种“逆向种族中心主义”。在打破西方知识的普遍性神话后，这种倾向转而谋求建立非洲知识的优越性。它将西方知识体系整体贬低为仅适用于欧洲的“部落知识”，而试图将非洲的特定思想（如乌班图思想）提升为解决人类困境的唯一终极答案。这种倾向的危险性首先在于，它在本质上重复了自身所批判的殖民主义逻辑，即追求一种单一的、等级制的知识秩序，试图将昨日的边缘加冕为新的霸权中心，这显然违背了去殖民化

①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p. 10.

②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p. 186.

运动追求多元、平等、对话的初衷。其次，为了构建这种对抗性的宏大叙事，它往往不自觉地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潭，将复杂多样的非洲大陆同质化。它倾向于抽取某一种或某一区域的哲学思想，将其提升为代表整个非洲的“泛非哲学”，从而遮蔽甚至压抑了非洲内部极其丰富的思想。这种内部的“认识论均质化”实际上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殖民，它忽略了非洲知识本身就是动态、流变且充满内部张力的历史产物。

第三种倾向最为复杂，它是某些激进后殖民理论的变种，即试图通过模糊“殖民”与“被殖民”的界限来消解去殖民化的政治紧迫性。这种观点倾向于将殖民历史美化成为一种双方都深陷其中、无从逃避的“文化相遇”或“杂糅体验”。在这种叙事中，“殖民”不再是需要被反抗的压迫结构，而成了一种共同的历史宿命。“后殖民”也不再是寻求解放的抗争过程，而变成关于身份流动的文本游戏。这种看似深刻的理论超越，实际上可能构成一种“智识上的取消主义”。它模糊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真实的权力鸿沟，将充满暴力的历史进程转化为一种审美的文化考察。更严重的是，当去殖民化被视为一种过时的“本质主义”追求时，非洲人民主动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便在理论上非法化。这种倾向否定了非洲人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将其永久锁定在一种被动、杂糅且无法自拔的文化身份之中，这实际上是将服务于全球南方解放的理论武器异化为西方学术圈内部自我指涉的话语生产。

非洲知识去殖民化必须在上述三重陷阱的张力中寻找平衡：既要坚持本土主体性，又要避免排外封闭；既要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又要警惕逆向霸权；既要承认文化的杂糅性，又要捍卫政治解放的紧迫性。这是一条狭窄而陡峭的道路，唯有保持反思性的自觉，非洲知识生产才能真正走出“反抗”的阴影，迈向“建构”的光明，为人类知识图景贡献一种真正独立且开放的“非洲可能”。

总之，回顾非洲知识去殖民化的理论探索，从维雷杜的语言分析、穆迪姆贝的考古学解构，到奥鲁卡的贤人哲学挖掘，我们看到一幅非洲思想家致力于修复历史断裂、重建主体性的努力图景。然而，我们必须客观地

认识到，尽管这些努力极具开创性，但非洲知识生产在全球学术版图中仍处于边缘与弱势地位。穆迪姆贝笔下的“殖民图书馆”虽已破裂，但并未坍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导的认识论范式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的学科建制与话语规则。因此，非洲知识的重建，注定是一个漫长、曲折且充满结构性阻力的过程。

去殖民化的核心诉求并非用一种“非洲认识论”去取代或推翻“西方认识论”，而是打破单一理性的垄断，为人类认知世界提供另一种可能。非洲本土知识中强调的社群关联、知行合一以及指向“充盈生命”的价值追求，应被看作对西方工具理性传统的必要补充与修正。它提醒我们，在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与抽象的逻辑推演之外，还存在一种基于生命体验与伦理共在的知识形态。在此意义上，非洲知识去殖民化实质上是推动全球知识体系走向真正多元化的关键一环。它将有助于我们将西方定义的“绝对普遍性”拓展为一种包容差异、平等共存的“对话式普遍性”。但这一过程也必须时刻警惕“逆向种族中心主义”的陷阱，避免陷入封闭的本质主义泥潭。非洲知识的未来，不在于自我隔离的独白，而在于以一种自信而开放的姿态切入全球对话。这是一场任重道远的“智识长征”，它不仅关乎非洲自身的文化复兴，更关乎我们能否共同构建一个更加丰富、公正且具有包容性的人类知识图景。

（责任编辑：陈雅慧）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Knowledg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Hu Pengzhi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knowledge ,aiming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and legitimacy of African knowledge ,dismantle the Western –centric narrative framework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just and inclusive global knowledge ecology. The epistem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fri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are distinctly embodied ,communal and practical; the justification of knowledge relies on communal consensus and practical efficacy ,and is ultimately oriented toward sustaining survival and communal harmony. “Epistemic colonialism ,” through linguistic hegemon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lonial library ,” reduces African knowledge to folklore and superstition ,resulting in a deep rupture in Af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knowledge constitutes a cor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for Africa to reconstruct its subjectivity and achieve genuine liberation. Its central claim is not to replace “Western epistemology ” with “African epistemology ,” but to break the monopoly of a single rationality and offer another possibility for human cognition. The community connection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the value pursuit of “the richness of life” emphasized by Afri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serve as necessary com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to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Despite facing numerous challenges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knowledge is a crucial step toward promoting the pluralization of the global knowledge system ,helping to expand the Western notion of “absolute universality ” into “dialogic universality. ”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ngage in global dialogue with a confident and open stance ,thereby constructing a richer ,more just ,and inclusive landscape of human knowledge.

Keywords: Afri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epistemic colonialism ,conceptual decolonization , “colonial library” ,dialogic universality

Author: Hu Pengzhi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 312000) .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New Trends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Christian Theology

Deng Haochen

Abstract: Contemporary African Christian theology has spiritually responded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cross the continent. Emerging within the decolonization movement of the 1950s ,it established its localised presence withi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circles during the 1970s through “Theology of Inculturation”. By the 1980s ,intensified social tensions shifted theological focus towards social realities: South Africa’s “Theology of Liberation” targeted apartheid; mainstream church theologians reflected on Africa’s predicament ,awakening Christians’ consciousness for transformation; Pentecostalism emerged as a distinct force ,attracting followers through “Theology of Prosperity”. From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there are several new trends “Theology of Reconstruction” calls for transcending liberation narratives to build post-democratisation communities; “Theology of Mother Tongue” emphasises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genous language exegesis to global Christianity; African Catholicism ,through two Special Assemblies of African Bishops ,advocates reg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Women’s Theology” critiques patriarchy ,reconstructing interpretive traditions through female experience. The various strands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Christian theology constitute systematic expressions by theologians seeking spiritual autonomy for Africa. This both represents the de – Westernisation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provide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the Global South.

Keywords: African Christianity ,theology of inculturation ,theology of liberation ,theology of reconstruction ,theology of mother tongue

Author: Deng Haochen ,Lecture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